

2024年第9期新闻稿：卑微的人，比杀死他们的子弹更可贵



《北纬24° 3' 55" 东经5° 3' 23" · 之二》阿马尔·布拉斯（阿尔及利亚）作于 2012年

亲爱的朋友们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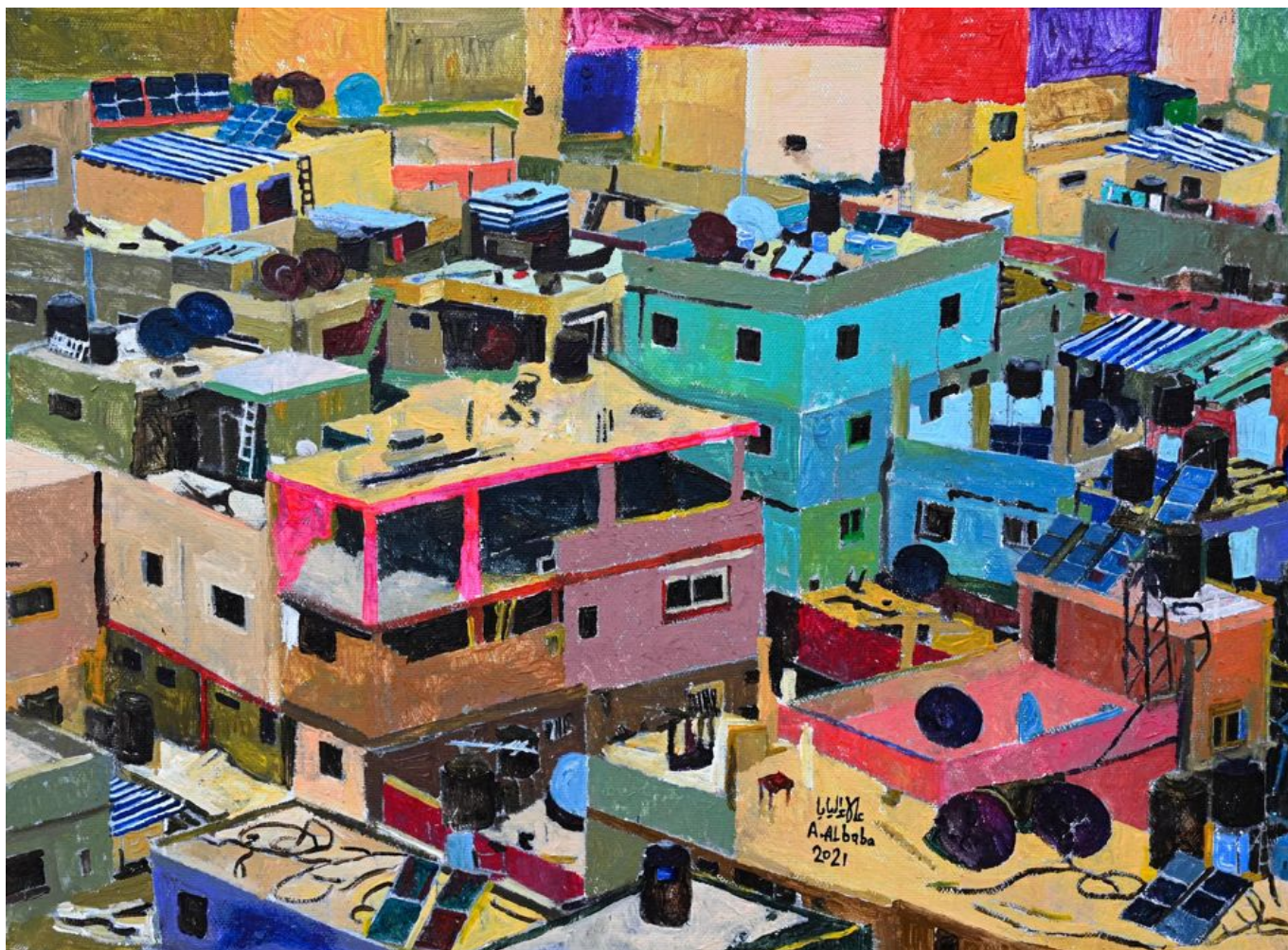
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！

2月20日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琳达·托马斯-格林菲尔德做了一份糟糕的工作：就阿尔及利亚关于加沙停火的决议投下否决票。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阿马尔·本贾马说，他提交的决议是安理会15个成员国通过对话形成的。然而，有人要求他推迟提交决议，但阿尔及利亚予以拒绝。他表示：“沉默不是可行选项。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并了解真相。”国际法院1月26日裁定“有理由认为”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是种族灭绝，随后阿尔及利亚誓言要通过安理会立即采取行动。

2023年10月7日以来，以色列在加沙已杀害了近 3万名巴勒斯坦人，其中有1.3万多儿童。自今年1月26日国际法院下令停止种族灭绝以来，以色列已杀害3000多名巴勒斯坦人。过去数月，150多万巴勒斯坦人（超过加沙地带人口的一半）从一个所谓的安全区逃往另一个随后遭以色列轰炸的安全区，他们目前被困在加沙最南端的拉法，这里现在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。拉法在10月7日之前只有27.5万人，现在却遭到以色列的轰炸。

尽管现实如此严酷，托马斯-格林菲尔德却说美国不能支持停火决议，因为该决议没有谴责哈马斯，而且据称会危及正在进行的释放人质谈判。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对此并不认同，他指出，否决决议

“无异于为继续杀戮大开绿灯。”他说，“只有熄灭加沙战火，才能防止吞噬整个地区的地狱之火。”



《第21号营地》阿拉·阿尔巴巴（巴勒斯坦）作于2021年

事实上，托马斯-格林菲尔德在安理会发言的同时，美国政府还**试图**向以色列提供 140亿美元军援。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，美国**已向**以色列提供了超过3000亿美元的援助，其中包括每年40亿美元的军援（以及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的数百亿美元军援）。2月11日，美国总统拜登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，非但没有批评种族灭绝，反而**重申**他们“共同的目标是击败哈马斯，确保以色列及其人民的长期安全。”托马斯-格林菲尔德投下否决票并非凭空而来。



《异体的终极分散》松井冬子（日本）作于2007年

否决权已在安理会使用近300次。自1970年以来，美国动用否决权的次数超过了其他常任理事国（中国、法国、俄罗斯和英国）。美国的很多否决票首先是为了维护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（该政权始于以

色列建国之年），其次是为了维护以色列不受任何批评。例如，1988年至今，美国行使了33次否决权，其中27次是为了维护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采取的行动。自去年10月7日以来，美国在联合国否决了三项要求以色列停止种族灭绝轰炸的决议（10月18日、12月8日和2月20日）。

尽管美国一再动用否决权，但“否决权”一词并未出现在《**联合国宪章**》（1945年）中。不过，《宪章》第27条第3款确实规定，安理会的表决“应以九理事国之可决票包括全体常任理事国之同意票表决之”。“同意票”的概念被解释为“否决权”。几十年来，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一直坚持认为，安理会并不民主，否决权削弱了安理会的公信力。非洲和拉美国家都没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，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印度也不是常任理事国。“五常”不仅主宰了安理会，还削弱了联合国大会的重要性，而联大通过的决议却没有强制性。



《疫情与生命》安娜·索菲亚·特里斯坦（哥斯达黎加）作于2020年

2005年，联合国召开世界首脑会议，评估世界秩序面临的高层次威胁。哥斯达黎加时任第一副总统林尼斯·萨博里奥·查维里在会上表示，“在涉及种族灭绝、战争罪、反人类罪和大规模侵犯人权的问题上，应取消否决权。”这次峰会之后，哥斯达黎加与约旦、列支敦士登、新加坡和瑞士组成“五小国集团”（S5），倡导改革安理会。它们在联大**发表声明**，明确指出“在发生种族灭绝、危害人类罪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情况下，任何常任理事国都不应行使《宪章》第27条第3款意义上的否决权。”但这并未产生任何影响。五小国集团于2012年解散，随后有27个国家联合成立了问责制、一致性和透明度（ACT）集团，主要就是为了改革“否决权”。2015年，该小组专门就联合国对严重违反人道法行为的打击行动分发了一份**行为准则**。截至2022年，已有123个国家**签署**了这一准则，但过去几年中动用否决权最多的三个国家（中国、俄罗斯和美国）并未**签署**。随着美国对中俄加剧紧张局势，这两个国家在受到美国攻击威胁的当下不太可能同意取消否决权。

《联合国宪章》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条约，旨在结束战争，确保每个人的生命都得到珍视。然而，我们这个世界却因国际上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而支离破碎，这种划分之下，一些人的生命比其他人更高贵。这种划分违反了《**世界人权宣言**》（1948年），也违背了对社会平等的基本共有诉求。例如，人们对保护巴勒斯坦儿童的紧迫感远低于保护乌克兰儿童（正如NBC新闻驻伦敦记者凯利·科比埃拉**所说**，乌克兰人并不是来自哪个地方的难民：“说白了……他们是基督徒，是白人。”）。这种国际上对人的划分一代又一代潜移默化左右着公众的认知。



《血泪之路》本尼·安德鲁斯（美国）作于2005年

在《拥抱之书》（1992年）中，我们的朋友爱德华多·加莱亚诺写了一个简短的“断片”，讲述了困扰这个世界的严重分歧，犹如一根冰冷的铁桩直插人性良知的核心。这个“断片”题为《卑微的人》（The Nobodies）：

跳蚤梦想买一只狗，卑微的人梦想脱离贫困，希望在某个神奇的日子，好运如雨突至，如倾盆大雨倾泻。但是好运雨昨天没有下，今天没有下，明天也不会下，永远都不会下。无论卑微的人如何呼唤，无论他们的左手如何发痒，还是某天他们用右脚起床，或是在步入新年时更换扫帚，好运也不会如毛毛细雨般落下。

卑微的人们是，卑微的人的后代，他们清贫如洗。卑微的人们是，一无是处的人，没有尊严的人，穷困潦倒，生不如死，倒霉至极，一再倒霉的人。

他们什么都不是，尽管他们是人。

他们不说语言，而是方言。

他们不信宗教，而是迷信。

他们不创造艺术，而是手工劳作。

他们没有文化，而是民俗。

他们不是人，而是劳动力。

他们没有面容，而是胳膊。

他们没有名字，而是编号。

他们不会被载入世界史，而是出现在地方志的奇闻轶事一栏。

卑微的人，比杀死他们的子弹更廉价。

热忱的，

Vijay